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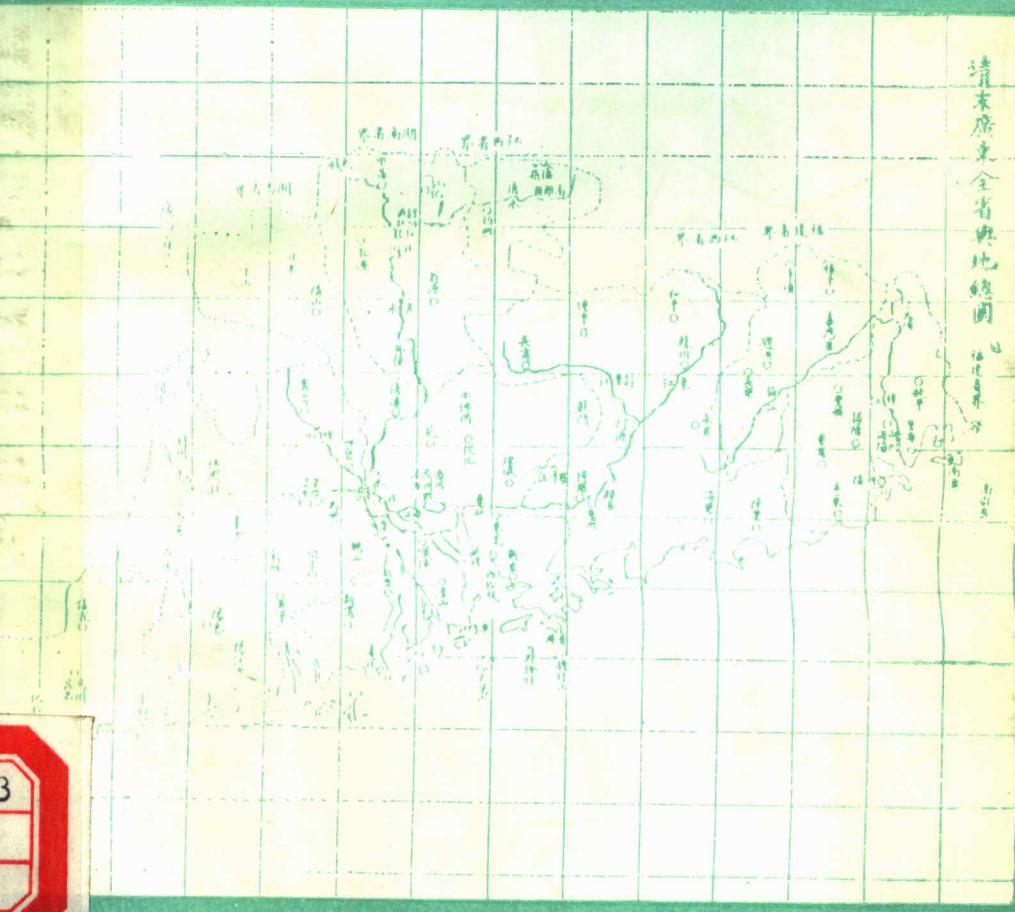
岭南歷史地理論集

徐俊鳴著

廣東全省輿地總圖

粵桂邊界

南澳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岭南历史地理论集

徐俊鸣著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学报丛书001号
岭南历史地理论集

责任编辑：洪哲雄

封面题字：侯仁之

封面设计：何志平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90粤印准字第217号

编辑出版：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广州）
排 版：广东计算机软件中心服务部
发 行：中山大学地理系

1990年11月

工本费：7.00元



著者偕夫人合影

(1977.9.15)

序 言

徐俊鸣教授，广东梅县人，1935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地理系。此后，他一直在教育的园地里辛勤耕耘着。在中山大学执教五十多个春秋里，他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培养了很多人才，桃李满天下，有的已成为著名的学者、专家。徐教授又勤于著述，硕果累累。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取得重大成就。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诲人不倦、品德高尚，向为同事和学生所钦佩。

徐俊鸣教授80大寿期间，广东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特在中山大学举行徐俊鸣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广东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院院长许学强，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黄伟峰，著名农史专家、81岁高龄的梁家勉到会祝贺，省地名学会、地方志学会、市地名学会、地方志学会、省市文博学会、省文史馆、省市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或负责人，华南师大、暨南大学、广州师院等高等院校教授亦到会祝贺。会上交流了历史地理学研究心得，宣读论文，会后还到徐俊鸣教授家致候。大家济济一堂，高度赞扬徐俊鸣教授50多年来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取得的成就，并认为应出版徐氏学术论文集，以资景仰，为后学指导方向。今本书杀青，同人嘱余为序。

徐教授是本人启蒙老师，他的《军事地理学》（与我的另一位老师孙宕越教授合著）给我启示了历史地理研究，本人在学生时代写了《衡阳城市地理》（《地理集刊》第2期），《兴安灵渠》（1943年《旅行杂志》第1期），即受启发而写的。徐师当时的代表作《中国历代统一之地理观》更是影响深远，不少同学和老师都给

予高度评价，因解放前历史地理专著较少，从全国观点来分析的更少。本人受影响也写了《秦郡考》（《岭南学报》1947年第7卷第2期）。就余所知，地理学者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徐师是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在老一辈学者中，历史地理多为历史学者所开拓，正如地貌学开拓于地质学者一样。而地理学者能一枝独秀，驰骋于历史地理学领域里，徐氏有奠基之功，诚不可没也，故余于徐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中，提出三点。

第一，即为地理学者治历史地理学之奠基者之一。他把地理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使历史地理学成为科学性较强的一门学科。

第二，徐师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半个世纪之久，他毕业后（1937年）即从事军事地理学研究，直到今天。国内学者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大不乏人，但一生从事此学者，并不多见。历时之久，也不多见。这种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的精神，甚至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也能坚持下来，是很不简单的。解放后，他仍坚持历史地理研究方向，也不简单。广州斯学之发展，远不如北京、上海、西安各地，既无研究所、室，连大学中的课程也不开设。他始终坚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并着手招收研究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地理学才和人类学、社会学等重新被重视起来，广东地理学会设立了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斯学得以勃兴，称他为岭南历史地理的奠基人，一点也不错。

第三，徐师专心注意于华南地区的研究也是很突出的，这从他发表的文章中，大部分为华南地区研究即可证明。一些学者每有趋时之弊，即随波逐流，时尚兴什么，写什么文章，东抓一把，西抓一下，结果不专不深，难成学问，徐氏则以华南地区为终生职志，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故能成我国一大家，功力之深，成就之大，与专之志矣。岭南地理学派以科学考察，学习新知和努力

创新为特色。徐氏治学亦反映此方面特征，如创新精神，即为我们所敬仰。兹举例说明如下：

城市地理是一门新兴学科，对城市起源、发展过程的研究显得薄弱，徐师独辟蹊径，开创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实一创举，余受影响，即作《广州历史地理》一书。以继其志也。

对军事地理的研究，亦为徐氏所倡，他配合抗战形势，把自然地理与历史经验结合写成专著，计有《军事地理学》（1939年）、《国防地理导论》（1943年）、《中国历代统一之地理观》（1947年），与近30篇军事地理论文，诚我国军事地理学的开创者也。

建国后，徐氏致力于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40年来，创见不少，成果每为学者所用，如梁方仲教授采用徐氏“唐宋元广东户口”之说，即为一例。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亦有不少独到见地，为学者称诵。如广州城市规划即重视徐氏的《历史时期珠江三角洲水陆变迁研究方法初步探讨》等文。

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徐氏能把地貌学、气候学、水文学等地理学科知识，与历史、考古、民族、地名、方志等学科溶化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并有突出的语言表达，使读者深受感染，非读不可，因他书不载，他文不记，是徐氏之论，学者不能不读也，兹又试为例述之。

黄巢起义军入粤问题，在《嘉庆重修一统志》中，有称：“巢走东粤”一语，复据《福建通志》有“巢走粤东”，因而定黄巢入粤，是由福建入广东的。但徐氏有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精神，据南雄、仁化、曲江、乐昌、英德、连县、清远各地的方志及唐代、宋代人的著作中，证实黄巢入粤是从江西入境的。明、清人著作，所谓“粤东”、“东粤”实指整个广东省而言，非指广东东部地方也。此为一例。徐氏治学从不盲从，研究认真，小问题也不放过。如余曾提出西关涌明代曾改道问题，请教徐师，久未见复，过一段时间，始

来函见告，同意此看法，反映徐氏查清楚之后，才作答复也。又余曾为文指出广州市北京路为宋街，因有文字记载可查。而徐氏读后，即函知认为唐代或更早，即已成街。他是从地理学上分析得知，可知他对小问题也一一弄清楚，而为余所敬仰者也。

徐师为人老实，不善从事应酬活动，惟孜孜不倦，手不释卷，故常有新作问世。在卧病期间，仍不断笔耕，或口授家人代笔。他胸怀磊落，以发扬历史地理学为心志，乐于为人服务，对后辈无私帮助，不顾年老体弱，仍当广东省地名志、广州市地名志顾问，省地方志学会顾问、梅县地方志编委会顾问。这种热爱事业的精神，很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徐师曾为余言，他说自己“生性懦弱”。故他不受重视亦可能与此有关，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在旧社会中的确如此。他没有贵显的亲朋照顾，有五位女儿，实在难于生活的。在大学中同事又多为洋博士、名教授。他由中学转来大学当讲师，其不受重视，乃当然之事。但是，这也是徐师有今天的成就的原因，即“发奋有以为之也”。苟非解放，情况则不堪设想了。

解放后，徐师困境始逐步解决，其爱党爱国的心情，即反映在他热爱工作和出色的研究著作中，意气风发，著作不断，论文不断，一心一意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而努力。在徐教授的身上，集中反映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至足感人，至足为后人法。“懦弱”有好的一面，即能避开不必要的人事纠纷，得安心于研究工作，养成一种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不干“文人相轻”之陋习。此余正佩先生之处，徐师深得人们的尊重，亦在此。

作为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代大师，徐教授是当之无愧的。

曾昭璇

1989年12月

目 录

序言	曾昭璇(1)
广州都市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	(1)
广州市区的水陆变迁初探	(10)
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	(29)
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和贸易对于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	(47)
宋代广州三城试考	(63)
对广州古城复原的一点看法	
——兼与《广州城始建考》一文作者商榷	(66)
三国东吴时期交广分治的若干问题	(69)
略论古代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72)
明代广州的海外丝绸贸易	(87)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略谈如何发挥广州的优势	(98)
古代梅县市发展过程初探	(104)
广东的客家多集居于梅县地区与黄巢起义	
军入粤路线的关系	(130)
韶关城市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	(132)
从马王堆出土的地图中试论“南越国”的北界	(149)
南风岭究竟在何处	(152)
略论古代肇庆在岭南的地位	(156)
试论唐代广东的人文地理概况	(168)
宋代广东经济地理的初步研究	(183)
元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	(219)

隋唐宋元间广东人户分布变迁的初步分析	(238)
广东各县市名称来源	(251)
广东全省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概要	(261)
对新编《连县志》的一些浅见	(301)
西沙、南沙等群岛的历史地理纪要	(305)
编制广东图志中历史地图的经验和体会	(319)
后记	潘梅珍(327)
历史地理学在岭南的奠基者	
——中山大学徐俊鸣教授	司徒尚纪(328)
良师的风范	郭培忠(335)
怀念父亲	徐小珍(340)
徐俊鸣主要著作目录	(344)

广州都市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

世代居住广东省或广州市的人，很多还不太了解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是怎样形成的，它在历代的面貌是怎样的，跟广东省的历史发展有多大关系。现在我就这个问题来谈一谈，也许对读者不会是毫无兴味的吧！

广州是华南最大最老的都市。它有悠久的独特的发展历史，具有多种多样的机能。2000 多年来，它逐渐形成为华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一个历久不衰的港市。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揭示了都市发展的基本法则，指出了都市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劳动分工的加深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发展的，但都市位置的选择和特殊风格的形成，却和自然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鸦片战争和解放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的两大转折点。在由这两次战争而分成的 3 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我国都市的发展是大有差别的。本文所论限于鸦片战争以前。在这段长时期内，从广州都市机能的转变和它在全国的经济地位的变化，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来说明：

（一）先秦时代形成原始聚落（纪元前三世纪以前）。

广州的原始聚落可能是珠江漏斗湾内的一个渔村，稍后则兼为农牧等产品交换的中心。我们所以说它是个渔村的原因，不特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顺序和华南沿海的一般地理环境，而且考古家由新石器时代的发现，证明珠江口一带曾有流动的渔猎部落。在市郊汉墓中也发现有陶船、陶井；而现在广州还有数万的水上居民等可作旁证。当然，人民的生活不能长久依靠渔猎。而位于三角洲边缘的广州附近地区，比地势较卑洼的三角洲内部更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开发。流动的渔猎部落在这片肥美土地

上逐渐定居下来从事农牧，是很自然的。

五仙人骑五色羊，持谷穗降临楚庭的传说，似乎可视为由别处传来农牧业的反映。这就是“五羊城”和“穗城”的名称的由来。

广州之成为珠江流域的一个政治中心，却和长江中下游的吴、越、楚有关。据说广州最古老的城市称为五羊城（或南武城），系周赧王时（公元前314—247年）越国（或吴国）遗民所筑。其后吴、越均为楚国所吞并，广州又曾有“楚庭”的名称。

从珠江三角洲现在水路交通形势看来，广州的地理位置似乎不见得特别优越。但这是几百年来河道的变迁的结果。古代北江主流原从芦苞涌直趋广州；西江则由今西南涌东来，二水会于官窑附近，然后经石门而抵广州城下，直至宋代还是这样，那时的广州确不失为东北西三江水运的枢纽。

从局部位置来看，广州都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和白云山的余脉（越秀山、番山、坡山等）有关，根据市区地势的高低，古六脉渠（下水道）的分布，以及一些零星的历史记载综合来看，广州市原籍聚落产生时的地形，仿佛是两个半岛：较东的一个可称为番山半岛（或番禺半岛）；较西的一个可称为坡山半岛（或南海半岛）；五羊城在“番山之隅”（或谓因有番山和禹山），即今旧仓巷一带（据番禺县志）。现在永汉路和文德路之间地势仍略为高耸，中山图书馆内和旧城隍庙后，均各有一个土阜，那就是番山（或番禺二山）的残余了。坡山在今惠福西路五仙观内，现尚有红色砂岩露出，石上有水蚀痕迹，从前的人附会为仙人足印。坡山在晋时尚为江边一渡口（见广州府志）。坡山以北不远有光塔，相传为唐代阿拉伯人所建，大概离当时阿拉伯商船停泊地总不会太远。

现在的长堤和西关一带，古时还是海湾，宋代仍有“小海”之称。据史载，海中有浮邱石、海珠石、海印石三个著名的小岛，由于后来长期的天然冲积和人工填筑，现在都已联在大陆上了。

(二)秦汉时代逐渐成为岭南经济中心(纪元前三世纪初至后三世纪初)。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岭南建立了南海、桂林和象郡。当时南海郡治在番禺。郡尉任嚣修筑了番禺城，俗称“任嚣城”。据《广东通志》载：“任嚣城在县东 200 步，甚窄隘，宋时为盐仓，即番禺县治也，后并入东城”。这时岭南已成为统一的中国的一部分，它和内地的联系加强，同时复有数十万汉族兵民的移入，增加了劳动力和带来了比较进步的耕作技术，使岭南的生产力提高了一步。番禺既是南海郡治，自然会跟着逐渐繁荣起来。秦末，赵佗利用北方扰乱的时机，扼守着南岭上的山隘，击并了桂林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那时番禺就成为两广和越南北部广大地区的政治中心了。南越就这样维持半独立状况达 90 多年。在这期间，岭南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番禺遂成为“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凑”（见《史记》）。这些热带的土特产，其中一部分是本地所出，也可能有部分是由外国运来的。汉武帝派五路大军重定岭南以后，海外贸易日繁，但当时我国对外贸易似以交州（今越南河内附近）为主（徐闻、合浦也有一部），番禺尚属次要，而当时番禺的政治地位也还是带局部性的，因为汉初岭南一带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和儋耳九郡（后二郡不久即废），同属于交趾（后称交州）刺史之下，当时番禺县仅为南海郡治，而交趾（或交州）刺史治则初在羸陵（约在今越南北部），后在广州（今封开）。

(三)六朝时代，交广并盛(三世纪初至六世纪末)。

后汉末，岭南为孙吴所据，当汉献帝建安 15 年（210 年），吴交州刺史步骘始将交州刺史治移至南海郡，把番禺城扩展到禺山以北。据说因由广信迁来，故改交州为广州（这是广州一名的由来，距今已有 1700 多年了）。这时广州已成为岭南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但不久交、广分治，合浦以北为广州，以南为交州。

这大概由于红河流域和珠江流域这两个经济中心的力量不相上下，而彼此距离颇远，难于合一的缘故。

西晋结束三国分立的状态不过五十多年，因五胡的进入中原而南渡，我国又有两百多年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黄河流域因屡遭兵燹，人民大量的流离转徙，南迁到长江和珠江流域来，使南方的经济力量逐渐追上了北方。广东境内的东、北、西、韩江等流域普遍建立了新县，而广东对外贸易亦逐渐有和交州并驾齐驱之势。东晋以后，外商在广州登陆的记载，甚至较交州为多。印度的佛教徒如达摩等，也由海道到达广州（现在西关下九甫的西来初地，即由此得名）。阿拉伯人在广州有居留地，华侨移居南洋等地的也渐多。这时广州相当富庶，成为贪官污吏搜刮的目标。《晋书·吴隐之传》称：“广州包山带海，珍珠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前后刺史皆多黩货。”《隋书·食货志》则称：“晋元帝居江左，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南齐书·王琨传》则甚至说：“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

（四）隋、唐、北宋，成为中国最大港市（六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初）。

中国在隋唐至北宋这 600 多年中，除五代这一期间外，余皆在统一时期。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内外交通网的扩大。如大运河的修筑，大庾岭道的两度开凿等等，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当时统治阶级已注意农田水利，如宋代在珠江和韩江三角洲中已开始建筑堤围，使广东粮食的生产大大增加。当时广东人口尚稀，有余粮输往闽浙，广州就成为当时的一个大米市（见全汉昇：《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但是广州的发展还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有着巨大关系，它在当时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市。据说外国商人（主要是阿拉伯人）居住在广州的就有数以万计，因为唐末是阿

拉伯正兴盛的时候，他们利用介乎欧、亚、非三洲间的有利地位，积极地进行国际转运贸易；同时，南洋各国如阇婆（今爪哇）、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占城（今越南中部）等，亦均日见繁荣，华侨移居南洋的也更多。所以这些地方的人民俗称中国人为“唐人”，称中国为“唐山”。唐宋时代中国手工业非常发达。在广东境内大量开采金、银、铁、铜、锡、铅等矿，唐代广东境内的矿场有 26 处，宋代增至 70 处（见章鸿钊《古矿录》），宋代韶州一带，是当时全国四大矿区之一。赵宋官府曾在此设置永通监来管理采矿事宜，“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金石萃编》）。甘蔗和棉花早已在汉代传入我国，到唐宋在华南各省已普遍种植，并用于制糖及纺织。神宗年间曾有地方官吏“役吏广州军人织造木棉生活”（见《玉照新志》），按当时所说木棉即今的棉，并非广州常见的巨大乔木的木棉。陶瓷制造也日见精美，广东也有不少陶瓷产地（潮州百窑村、广州西村等地宋代古瓷窑遗址发现）。汉代我国茶叶主要产地还在川滇，到了唐代，茶叶生产已逐渐向东南各省推广。这种种自然都促成了广州都市的繁荣。

还有，唐代我国制船技术已很高明，所造的海船比大食（阿拉伯）和狮子国（锡兰）等地当时所造的船更为巨大而牢固。不单中国人出洋多乘中国船，连外国人也喜欢坐中国的船了。到了北宋，指南针又使用在船上（见《萍洲可谈》），使船舶可以直放大洋，而无须沿岸航行。此外，由于佛教的传入和统治阶级的生活的日趋豪奢，各种珍贵的消费品的入口也日见增加。乳香一项尤为大宗。这些货品绝大部分是由广州进口的，宋代特在广州设“香药库使”来管这种贸易。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使广州当时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广州既成当时中国的最大的港市，人口当然会大量的增加（数字多少尚待研究），因此城垣就一再扩筑。尤其在北宋期间，

曾先后增筑子城、瓮城(3个)、东城和西城，除瓮城较小不计外，其余合称为三城。这些城址的位置，由于后来(明初)改建，已难于确认。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隋代(或谓更早在六朝梁代)已在番禺县境分出了南海县，故北宋所筑的东城是番禺县的中心，而西城则为南海县的中心。并由于深水道偏在西南方，“蕃舶”和“蕃坊”(外国船停舶位和外国人居住地)，均在西南方，所以当时广州的繁荣中心已向西南移至南海县境了。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北宋末在京设榷易院(政府专卖局)，把贱价收购来的外货售给人民，借以图利。

(五)南宋、元、明初是泉、广竞争阶段(十二世纪初至十六世纪初)。

南宋至元、明初，因东南沿海的其他港市起而竞争，广州市对外贸易地位相对地低落了。其中劲敌首推福建的泉州。泉州在宋代设置市舶司，后于广州约一百年，它的高度发展是在宋室南渡以后的事。由于我国古代的进口货物，多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嗜好的奇珍异宝，主要的消费地在首都，而南宋的首都为临安(即今杭州)，泉州至临安的陆道显然比广州更为便利；而且自北宋以后，海船造得更大，又有指南针，自泉州开航，可以利用冬季台湾海峡的东北风和南下的海流(东中国海流)，顺风顺水直放南洋；所以到宋末、元初，广州的对外贸易地位，就为泉州所取代了。

元代，政治中心虽然移至北京，但因元政府非常重视海上运输，它任命擅蕃舶之利30年的泉州提举市舶司蒲寿庚(阿拉伯人)联络海外，以复互市。所以泉州的地位仍得暂时维持。到了明初，设市舶司于明州(宁波)、泉州和广州，并规定明州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即今台湾)，广州则通占城、暹罗及西洋各国。由三个港市的对外贸易范围看来，广州显然是占优势的，但当时明政府对外贸易不够积极，太祖洪武14年(1381年)曾一度废除市舶

司，并下禁海令。到明成祖时，命郑和七下“西洋”，使中国和南海以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贸易又比较活跃起来。可是当时中国造船的中心在长江下游，放洋的地点在福州，广州的对外贸易却无多大提高。泉州以港口淤塞，贸易范围缩小等，也逐渐衰落了。

但是自元朝以来，广东华侨外移日多，明初郑和通西洋后，华侨在南洋的地位提高，又促使华侨更多的外移，这使广州仍不完全失其海外贸易交通的地位，而且明代广东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据《广东新语》提及的，有用以灌田的自转水车，有用一手而能有两牛之力的新式耕具（木牛）等。同时建立新县不少，顺德县也分立了。广东经济的发展，使广州不失为一重要的都市。南宋至元、明初广州城垣修建的情况是：“南宋有数次的修缮并在南边加筑雁翅城；但规模最大的是明太祖洪武 13 年（1380 年），那次把三城合一，向北拓展到越秀山后，周围 21 里余。著名的镇海楼（五层楼），就是这时由永嘉侯朱亮祖建筑的。

（六）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广州在海禁中重复兴盛起来，（十六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中）。

明嘉靖以后，一方面由于东南沿海倭寇侵扰日剧；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商权衰落，葡萄牙、西班牙等西南欧殖民国家代兴，这些国家都进行海盗式的海外贸易，使当时中国政府大有戒心。嘉靖元年（1522 年）撤废福建和浙江二市舶司，仅留广州一处。嘉靖 14 年（1535 年）市舶司曾一度移设于濠镜（即今澳门）。十六世纪初，西、葡等国势力侵入南洋。荷、英、美、法等国的商船也接踵前来广东，所以“澳门独为市舶薮”。嘉靖 32 年（1553 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据我澳门，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最早的一个据点。

明清两代，他处市舶司屡有裁并，惟广州除明嘉靖及清顺治康熙年间二次厉行海禁时代外，经常都保持着对外贸易，所以明